

风声 | 拜登新政一年，为何六成美国人买他的账（中）



今年1月，是2021年激进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的“政变”周年。如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们，仍然坚定地表示2020年的美国大选是一场“舞弊”选举，并且将邮寄选票的开票时间差理解为拜登“作弊”的证据。这一被民主党人称为“大谎言”的政治论述，让特朗普拥有了继续控制共和党，并在2024年卷土重来的民意基础——公共宗教研究所在2021年1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2%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是被窃取了胜利果实的选举获胜者。

于是，在“国会山骚乱”一周年之后，自由派和进步派的美国知识分子或媒体人，纷纷撰文警告“民主衰退”的风险。一向以宣传美国自由民主制著称的学者拉里·戴蒙德就认为，“世界民主”的未来寄托于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在内部摇

摇欲坠的超级大国”。他认为，美国的选举机制没有足够制度保障，而改革非常缓慢，试图保障选举制度的投票权法案在参议院也没有得到共和党人支持。

戴蒙德的观点被很多类似的公共知识分子宣扬，比如纽约巴纳德学院政治科学教授亚历山大·库里（Alexander Cooley）和乔治城大学教授丹尼尔·内克松（Daniel H. Nexon）在2021年底发表于《外交政策》的文章中，就提出美国要和“非自由”的力量战斗，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重整自由民主制”。

平心而论，美国自由主义知识界也许高看了美国政治制度在全球的关键程度。尤其是，“自由民主制”并不见得因为在美国遇到了危机，就真的在全球范围内衰退了。比如，2021年

结束的德国大选，宣告了长达近16年的“默克尔时代”结束。在这个节点上，德国实现了又一次政党轮替。这次醒目的是，绿党支持度的大幅上升。

追溯历史，绿党起源于1968年反对欧洲战后秩序的社会运动，受到美国民权运动乃至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影响：他们既反对“老欧洲”的保守主义，也反对亲苏联的传统欧洲左派。略微夸张地说，绿党的兴盛，意味着美国出产的政治文化即使在美国衰落，也依旧在很多地方继续发展。

但在美国自身的语境下，与其说“衰败”的是“民主”，不如说是两党制的美国政党体制。“衰败”，是两党制在过去四十年里积累的压力与张力无法再被继续消化的产物。这一政党体制，极难从已经定型的、难以为继的政策道路和互动模式中突围，也无法再为改革提供足够优质的选项。

实际上，民主党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同盟，对于成员的“背叛”，民主党无法用政治资源或其他要素去“收服”，也无

法以内部协调方式改变他们的想法。民主党议员的权力来自于初选胜利和当地选民的投票，而非来自全国委员会或其他党内机构的指派和部署。党内的意识形态也五花八门——既有强调正义和种族议题的进步派，也有希尼玛和曼钦这样认为自己是中道价值维护者的中间派。

没有中间道路的选择

目前，共和党在“反对民主党”的路线上显得更一致。在拜登时代，共和党更加围绕着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团结起来，对抗拜登的种种“改革计划”；而民主党则在内部缺少动员力和足够凝聚力，关键时候被两名“党内不同意见人士”拖住阵脚，深陷泥潭。

两党的政治文化和组织方式大相径庭。这是美国两党体制的多年习惯，也即社会学家迈特·格罗斯曼所说的美国政党体制的“不对称性”。所谓“不对称”，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交锋，而是在不同的维度上拉拢自己的基本盘，以期赢得选举——所谓进步和保

守、多元和传统、大政府路线和小政府路线的对抗，只是某种表面现象。

在选举中，美国选民的整体意识形态支持保守的小政府理念，因而共和党不断加强自己的保守意识形态以迎合选民的意识形态偏好；另一方面，就算是保守理念居多数的美国选民，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也倾向于更高政府支出和赤字，从而民主党不断把自己打造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倡导者，去迎合选民的现实考虑。这样，两党都在自己的维度上获得了选举胜算。

乍看这似乎反常识，但回溯过去半个世纪的美国政治经济走向，这种模式其实毫不意外——里根政府一边大规模减税，一边推高政府债务赤字；克林顿和奥巴马时代增加了更多政府职能，却没有能够落实一直主张的为富人加税的政策。

特朗普时代一边减税，一边将联邦政府支出推到历史新高——近四十年来，共和党政府都没能在任内成功缩小政府的支出规模，民主党政府也没能在任内成功为富人增税。